

唐宋八大家传
①

韩愈传

陈新璋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传 (1)

韩 愈 传

陈新璋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愈传/陈新璋著.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9

(唐宋八大家传; 1)

ISBN 7-5361-1950-X

I. 唐… II. 陈… III. 韩愈-传记 IV.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560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内 20 栋)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86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61-1950-X/K·75

印数: 1001~2000 册

定价: 14.50 元

《唐宋八大家传》总序

唐宋八大家者，唐宋文坛之八颗巨星也。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晓得他们就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及曾巩。“八大家”之称，虽然晚至明代才提出，但他们在活着的当时，已拥有浩浩荡荡的追随者，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准确估量，关于八大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真可谓卷帙如山了。

如今继续啃死人骨头？还有味道么？至少我们认为，答案是不宜简单否定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曾目睹过不少伤筋折骨者，据给予治愈的杏林高手透露，那主治的丹方中就用了枯骨所研成的细末。啃死人骨头的目的，理应是为了活人。世易时移，活人的病变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枯骨何以更有效地治疗今疾？这就存在着继续研磨的需要。

文章最忌随人后，著述从来贵创新。赶时髦并不意味着创新。不知始于何时，“运动”一词时髦起来。在那不断地运动群众的年代，“运动”更是时髦得很，以致我们的一些学者也趋附了，把八大家及其追随者在不同时代的分散努力也冠之以“唐宋古文运动”的名堂，髦得可爱。然而名实是否相符？本丛书有的著者就提出了新的见解。

往昔的论者，多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来概括八大家的文学主张，认定他们的宗旨是“复古”、“兴儒”。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八大家说过不少“志乎古道”、“文必与道俱”之类的

话，但这“道”的实质，仅是古儒之道，乃至腐儒之道吗？不。“复古”、“兴儒”恐怕只是他们打出的旗帜，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摧毁那华而不实、束缚自由的骈俪文风，推动文学朝“言必近真”、“文从字顺”的方向革新。不然的话，他们的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至理名言将作何解释？“词必己出”，“古人亦人耳”，只宜“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云云。显然，他们是坚决反对拘泥古训、吃古不化的。

四人帮曾经鼓吹过臭名昭著的“帮八股”，其流毒虽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荡涤，然而有些人，也许余悸在心，也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迄今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并未蔚成风气，动辄有“打棍子”、“扣帽子”之类的帽子飞来；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惯势，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价。本丛书试图克服这种种偏向，尊重历史事实，扬善而不溢美，抑恶而不失真，还八大家的本来面目。所谓“八大家”，是个文学概念，因此，本丛书着重勾勒传主的文学家形象，即使是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开拓新思路，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八大家所走过的道路，挖掘他们最可宝贵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究他们成功的奥秘，为酿就新时代的新文风贡献绵力。这就是组编本丛书的终极目的。

“不泥古”、“不落套”既然是八大家的作风，本丛书也就不打算从体例、格调、篇幅等方面去强求死板的一致，以免形成新的俗套，束缚诸位著者学术专长的自由发挥。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为行文方便、避免重复起见，只好委屈“三苏”合为一卷，并非缘于粗制滥造或因陋就简。这是要向读者诸君特意说明的。另外，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西，因此我们特约请江西籍或长期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专家撰稿。他们出于对古代乡贤的仰慕，

长年潜心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相信他们是不会令读者失望的。

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坛巨星，愿这小丛书伴随着众多的新星焕发光彩。

杨明新 何业光

1996年中秋于广州天河城

序

梁鉴江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河、湟之地未能收复，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战祸频仍，赋税繁重，民生困苦……这一切标志着中唐国势的衰落。韩愈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走完了坎坷的人生旅程。

韩愈的仕途很不顺利。他四举于礼部才考中进士，三试于吏部皆落选，最后不得不以幕僚走进官场。从贞元十二年（796）在董晋幕中任观察推官，到晚年官吏部侍郎，其间两次被贬岭南，历尽了仕途的坎坷。在政治上，他不是王叔文那样的风云人物，也没有裴度那样可以施展拳脚的地位。他长期沉浮于中下僚，晚年虽跻身于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没有独当一面的权力。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反对藩镇割据，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平淮西吴元济之乱，长庆二年（822）以兵部侍郎宣慰镇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反对宦官擅权，“日与宦者为敌”，敢于触动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吐突承璀。他从维护儒家思想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坚持排斥佛、道，冒死谏迎佛骨。他同情人民疾苦，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大旱，上书请求缓征关中赋税。他为培养人才殚精竭

力，无论在国子监还是在贬谪之地，他都热心于青年的教育培养工作。

韩愈的历史贡献主要在文学方面。在文学舞台上，他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中唐文坛，在变革中走向繁荣。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孟郊……继李白、杜甫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一代的文学；在这些作家当中，以白居易、韩愈最为杰出。白居易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探索诗歌的改革，并尽可能把诗歌写得平白易懂；韩愈则致力于文体和诗体的新变，创作出彪炳后世的散文和雄丽奇崛的诗篇。

先秦、两汉通行散句单行的散文。这种句式自由、便于表达思想的文体，后来逐渐为句式整齐、讲究对偶、注重音韵的骈文所代替。骈文滥觞于秦、汉而兴盛于六朝，至中唐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早期的骈文虽也产生过优秀的作品，但这种格律化的文体严重束缚作家的思想，其末流则变成空洞无物的游戏文字。韩愈继承了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的文体改革精神，借先秦、两汉的古文文体来抵制当时流行的骈文。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文道合一，以道为先。二是主张文句要自然、流畅、准确，文章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三是主张语言文字的创新，提倡“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由于他大力鼓吹，由于有柳宗元、李观、欧阳詹等文坛朋辈及李翱、皇甫湜等“韩门弟子”的积极响应，加上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作家创作出一批堪称典范的作品，文坛很快出现一股创作“古文”的热潮，“自贞元末以至于兹（长庆末），后进之士其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韩吏部行状》）。韩愈文体改革的胜利，扫荡了六朝以来文章的浮华柔媚之风。骈文的统治地位逐渐为“古文”所代替。由

韩愈开创的“古文”传统延续至宋、元、明、清各代。

我也不同意将韩愈等人的文体改革称为“运动”，因为它自始至终都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古文”作家，不过是一个有共同志趣的文学群体（不是团体），他们在文坛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没有“运动”的自觉的计划和组织。我不认为韩愈等人的文体改革是一场思想运动，以宣扬儒学为目的。在封建政体下，没有皇帝的参与和支持，谁又能发动和领导一场“思想运动”？实际上当时也并不存在什么“思想运动”。诚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韩愈等不可能超越儒家的思想范畴来从事文学创作，但他们都不是儒学家，朱熹对韩愈的儒学修养就很不以为然，更遑论别的“古文”作家了。韩愈也说过“文以明道”的话，但这里的“道”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文以明道”仅说明文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不是要求作家自觉地去宣传儒家道统。文体改革客观上固然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但文体改革的主观目的仍在于文学创作的革新。

盛唐诗风的新变始于杜甫。“安史之乱”这场国家民族的浩劫，深刻地改变着杜甫的精神面貌。他由外向转而内省，由自信乐观变为苦闷彷徨。“万方多难”的时局，促使他对社会人生作更多的思考。以反映离乱、感时伤世为主要内容的杜诗，已没有典型盛唐诗歌的雍容的气度和昂扬的特质。杜甫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后。高华壮美的盛唐之音已失去它的社会基础。杜诗表现出典型盛唐之音所没有的沉郁顿挫。“以文为诗”在杜诗中已露出了端倪。杜诗抒情掺入了思辨，写景叙事当中表现出诗人对社会人生的内省，较之典型的盛唐诗歌，杜诗更注意句式的变化、语言的提炼和典故的运用。杜甫是中晚唐乃至宋代诗风的开拓者。可以说，杜诗是盛唐之音向中晚唐诗风转变的过渡。韩愈继承了杜甫诗体变革的精神，在高华壮美的盛唐诗歌之后，创造

出雄丽奇崛的新诗体。韩愈的诗形象鲜明，想象奇瑰，用为文为赋的笔法，造成雄伟的气势，喜用拗字硬语，追求奇险生新，在唐代诗歌中别树一帜，被誉为“昌黎体”。韩愈与杜甫同是对宋影响极大的唐代诗人。苏轼深受韩愈影响，他的诗议论风发，正是韩愈“以文为诗”的发展。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对韩愈极为推崇，江西诗人提倡学韩、学杜，他们的一些纲领性的理论，奉杜甫、韩愈为主臬。江西诗风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韩愈的诗中找到渊源。

陈新璋先生的《韩愈传》，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展示了韩愈作为一代大散文家、大诗人的人生风采，对他的品格、成就和影响作了公允、充分的评说。翻开《韩愈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激愤与忧患、成功与挫折、苦闷与追求，可以看到他对朝廷的忠诚、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朋的热爱、对后辈的关怀，可看到他纵横的议论、雄壮的歌唱……本书以丰富的材料、深刻的议论，显示出作者在韩愈研究方面的功力。作者既充分汲取当代韩愈研究的成果，又不囿于成说，表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对韩愈为名利而奔走干谒、在“永贞革新”问题上的态度、排斥佛道又与和尚为友等等，作者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对韩愈这个历史人物，作者既充分肯定，又不掩饰他的缺陷，在人物形象的总体把握和文学成就的评价方面，都能做到言之有据。

我相信，韩愈的爱好者，可以用《韩愈传》这把钥匙，进入多姿多彩的韩愈世界；韩愈的研究者，可以从《韩愈传》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1996年3月于广州天河

目 录

序	(1)
---	-----

上编 韩愈的生平

一、少年时代	(1)
二、求仕十年	(11)
三、幕僚岁月	(21)
四、初任博士	(32)
五、贬谪阳山	(42)
六、再任博士	(54)
七、八年浮沉	(64)
八、从征淮西	(75)
九、再贬岭南	(85)
十、国子祭酒	(96)
十一、晚年风采	(106)
十二、韩愈其人	(116)

下编 韩愈的文学成就

一、关于“古文”的主张	(129)
二、“古文”作品概观	(144)
三、散文的文学特色	(157)

四、诗歌创作风貌····· (215)

后记····· (231)

上 编

韩愈的生平

一、少年时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在思想、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为中华民族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韩愈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个人无法选择时代，而时代却制约着个人。韩愈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

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和穆宗五朝。这个时期，唐朝经历过“安史之乱”，正由强盛转向衰落。虽然在唐宪宗当政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中兴”景象，但是从盛唐时期就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反而逐步向更深广的方面发展。

从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来说，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广大农村（尤其是中原地带的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国

家财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人民的赋税加重了。而在战乱中乘机拥兵自肥的各地军阀，在战乱平定之后，在自己统辖的势力范围内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就使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说，一方面，地方割据，蔑视朝廷，使中央的威权大大下降。地方军阀恃强凌弱，互相残杀。其间虽也出现过暂时的统一和安定，但“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深刻裂痕并没有得到弥合。另一方面，朝廷上宦官与朝官争权夺利的局面愈演愈烈，宦官与地方军阀互相勾结，共为不法，蠹害朝政，使朝廷统御全国大局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来说，由于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曾利用过一些军力较强的部落，客观上为这些少数民族集团兵力入扰中原提供了条件。他们恃功要挟，索取无厌，增加了唐王朝的财政负担。有的少数民族集团与地方军阀互相勾结，对抗中央，或恣意侵扰内地居民。有的地方政府从肥己自强的目的出发，常常无端掠夺辖区之内或邻近的少数民族居民。这些都使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导致唐王朝迅速衰落甚至走向覆亡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大矛盾的存在和激化，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甚至覆亡，可以说是颓波难挽了。

韩愈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思想政治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唐朝在思想领域方面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并无民主、自由可言。但乐于以汉朝为榜样的唐朝，却不延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而是儒、道、释三家思想并举，三家思想都加以利用。这就为思想界开展诸家争鸣，繁荣学术和文学艺

术提供了较好的氛围。许多文人学士在这样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各有建树。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种状况，在盛唐时期已经出现过，而在中唐时期，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向思想界提出了新的问题，思想界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在新的现实面前各以独特的见解予以回答，从而开创了不同于盛唐的新的繁荣的局面。

在政治领域中，唐朝也比以前任何朝代来得开明。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它废除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科举取士的制度。虽然在实行过程中，不时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弊病，但它的客观效果却是既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制度，又有利于人才辈出。一大批门第不高的有用之才就通过这个途径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本领，体现自身的价值。与此相适应的科学、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奋斗不息，尝尽人生百味，可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韩愈就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环境中奋斗了一生。

韩愈（768—824），字退之，号昌黎，唐代河南府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

关于韩愈的籍贯，有许多种说法：

一、南阳。这是诗人李白说的。李白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序》说：“君名仲卿，南阳人也。”仲卿是韩愈的父亲，曾任武昌令，有政绩，离任后，县人刻石颂德。既然韩仲卿是南阳人，韩愈当然也是南阳人了。而南阳在哪里呢？《新唐书》说是邓州所辖，朱熹说是怀州修武。

二、昌黎。这是韩愈自己说的。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中自称“昌黎韩愈”。按当时的习惯，在人名称谓之前喜欢冠上籍贯。既然韩愈自冠以“昌黎”，则为昌黎人无疑了。

三、河阳。这也是韩愈自己说的。他在《女挈圻铭》一文中说送女儿的尸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古时人们相当重视死后归葬于故乡。韩愈称韩氏家族的坟墓在河阳，那他本人也当是河阳人了。

以上诸说令后人莫衷一是，于是考证蜂起。今人除了根据文献资料进行考证之外，还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文物遗迹进行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认为：“南阳说”是错的，“昌黎说”无案可查，韩愈自称昌黎，主要是郡望所致。因为北魏时，昌黎之韩名噪一时，到了唐代，韩姓一般自报祖籍昌黎。而韩愈的籍贯实是河南河阳（今孟县）。至今，河南省孟县境内还保留着韩愈的祖茔、韩愈的墓地、墓碑和他儿子韩昶的墓志铭、侄孙韩湘的墓冢。

韩愈的家族世代为官。七世祖韩茂，在后魏任尚书令，封安定王。六世祖韩钧，在后魏任金部尚书，并承袭父亲封爵。高祖韩暉，在唐代任雅州刺史。曾祖韩仁泰，曾任曹州司马。祖父韩睿素，曾任桂州都督府长史。

韩愈的父亲仲卿，曾与李白、杜甫交游；当过武昌令。当时正值“安史之乱”，中原一带生灵涂炭，而他所治理的武昌县却“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邻县人民闻风而至，不到两年时间，人口增加三倍。由于有惠于民，离任之后，士民为之刻石称颂，碑文就出自李白之手。后来调任鄱阳令，兼摄数县。晚年任秘书郎，死后赠尚书左仆射。

韩愈有三个叔父：少卿、云卿、绅卿。少卿，任当涂县丞，“感慨重诺，死节于义”。云卿，官至礼部侍郎。在大历年间，文章冠世，“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皆来延请。绅卿，“幼负美誉”，“才名振耀”，直言敢谏。历任高邮尉、扬州录事参军、泾阳令。在县令任上，目睹权豪富贾霸占河道筑堰阻水

经营磨碾以谋利，极大地妨害农民正常的耕种，于是“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

韩愈有两个哥哥：会、介。韩会“善清言，有文章”，能说会写，颇受当时文坛名家李华、萧颖士的赏识。他对于时行的绮艳文风，“慨然独鄙”。作《文衡》一篇，强调文章必须“统三才”、“理万物”、“叙损益”、“助教化”、“陈善恶”、“备劝戒”，反对离本逐末，浮诞僻放，追求形式主义。他与当时的名士卢东美、张正刚、崔造交友，好谈经世韬略，以王佐自许，时人称为“四夔”（夔，指尧时的贤臣）。大历年间任起居舍人。“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韩滂墓志铭》）。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被唐代宗处死，韩会被认为元载同党，因而被贬为韶州刺史。不久死于韶州，终年仅42岁。韩介“为人孝友”，任率府参军，有二子：百川、老成。老成过继韩会，有二子：湘、滂。

韩愈有三个堂兄弟：俞、弇、岌。韩俞、韩弇是叔父云卿之子。韩俞任开封尉，“喜酒色狗马”，不务正业。有二女三男。长女嫁四门博士周况，次女嫁殿中侍御史张彻；三男名无竞、启馀、州来。韩弇任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有女嫁韩愈的学生李翱。韩岌是叔父绅卿的儿子，任虢州司户，韩愈说他“以能官名，少而奇，壮而强，老而通”。

韩愈有二男五女。儿子昶，小名符，官至检校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昶有五子：纬，官复州参军；绾，咸通四年进士；袞，咸通七年状元及第；绮、纆俱为进士。（《韩愈祖孙五代世系表》见本章后附）

从以上叙述看来，韩愈的家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世代为官，但多为中小官吏；一是世代能文，尤其是叔父云卿和哥哥韩会都曾在文坛上有过一些活动，这些对韩愈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史籍上未有明确的记载。但韩愈一生为官为文的生活道路